

分析哲学主流之外的英美政治哲学

北京大学哲学系 赵敦华

20世纪初的英美分析哲学家把逻辑和语言当作专业技术,认为政治义务与他们从事的哲学职业是两回事。

英国经验论从洛克开始有与自由主义结盟的传统,密尔把功利主义发展为自由主义的新形式。20世纪初的英美分析哲学家把逻辑和语言当作专业技术,认为政治义务与他们从事的哲学职业是两回事。罗素在一战期间的反战活动,维特根斯坦在一战时为奥匈军队的中尉,二战时在伦敦一家医院实验室当义工,但这些经历与他们的哲学思考都没有关联。1932年奎因访问维也纳学派时,目睹了法西斯主义的猖獗,他后来回忆说:“我感到西方文化处在崩溃的边缘,我能做的一切只是逻辑哲学。”虽然二战时他在海军服役,但他的逻辑哲学并不包括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,反倒蕴含着认为不同社会群体间不可交流的“不可译性”的狭隘理论。即使是躲避法西斯迫害而流亡英美的逻辑哲学家卡尔纳普、莱辛巴赫、弗兰克、费格尔、卡夫曼和亨普尔等人,也没有发表过反法西斯主义的著述。

但二战对分析哲学的发展方向有间接的、隐晦的影响。英语世界的人民和政府坚守固有的传统,与法西斯主义展开全面的斗争,二战的胜利增强了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、基本常识和社会共识的信心。人们意识到,早期分析哲学坚持按照纯粹、绝对的逻辑主义标准确定真假是非,不利于维护日常生活的伦理价值,甚至有可能助长道德上的无原则性和思想上的僵化独断。战后的分析哲学由逻辑分析转向日常语言分析,在日常生活和语言中阐发真理,把普通人的意见当作意义标准,适应了英美社会维护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保守倾向,旨在抵制20世纪初兴起的激进思潮对西方文明的冲击。即使如此,分析哲学也没有提出关于政治哲学的学说。

二战后,英美政治哲学在分析哲学的主流以外发展起来。波普尔认为逻辑实证主义有教条主义倾向,而分析哲学“元语言”的分析方法也无助于解决科学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实际问题,他按照证伪主义的方法猛烈批判法西斯主义等激进思潮。他和哈耶克的政治哲学代表了“冷战”时期反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。当矛盾焦点转移到西方各国内部时,罗尔斯“努力把洛克、卢梭和康德所代表的传统的社会契约理论普遍化,并提升到一个更为抽象的高度”,建立了代替功利主义的正义理论,是标志自由主义发展的新的里程碑。他的自由主义试图在福利社会主义与竞争资本主义之间保持平衡,并同时遭到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批评。诺齐克为“最大的个人利益和最小政府”的自由主义原则辩护,反对国家干预经济,对个人财产进行分配和再分配,而他的思想更适应撒切尔、里根的保守主义经济政策。

自由主义把个人权利置于国家利益之上,不管向左或向右调整,都难以凝聚社会认同感,难以为国家应对危机提供理论支持。社群主义试图克服自由主义的消极作用,强调文化传统和政治参与的积极作用。问题是,西方社会中有各式各样的“社群”:宗教的、民族的、政治的、职业的、企业的、地区的;每一个社群都有自己的传统或习俗,都在政治上积极地表现自己。比如,同属保守主义阵营,斯特劳斯企图整合古典保守主义的思想传统,克服西方社会的现代危机,而亨廷顿则主张把“W(白人)AS(盎格鲁-萨克森)P(新教)”的传统当作国家认同,以应对国际冲突和危机。因此,无论自由主义、共和主义还是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,都难以整合西方世界多元文化和异质传统。

罗尔斯看到政治哲学的这种困境,他承认,不管一种普遍学说如何合理,都有自己的对立面。各种普遍学说虽然互不相容,但它们之间有一定的交叉点,在这里将汇集产生一些中心观念,而

在政治上公民所能达成的交叉共识应是政治自由主义的主张。哈贝马斯早就提出了类似的社会交往和商谈伦理的理论，但其实践很难在不同的政治、宗教信念中间产生共识。其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：“‘思想’一旦离开‘利益’，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”。离开经济的、文化的、民族的、阶级的利益的“商谈”是空谈，任何对话理论都难以奏效。那些推崇西方政治哲学的人值得以此为鉴。